

湖湘非遗传承的数字化创新探索

王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湖湘大地自古文脉绵延，孕育了湘绣、滩头年画、土家织锦、铜官窑陶瓷等众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艺术凝结着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化转型赋能非遗的创新路径

一段时间以来，在现代工业技术快速发展和全球信息化浪潮席卷之下，非遗面临传承匮乏、展示手段单一、资源整合滞后等问题。然而，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非遗构建起跨越时空和形态限制的信息传递方式。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不仅拓宽了非遗的传播渠道，还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在数字化的语境中，非遗能够通过虚拟展示和互动体验，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比如，通过打造“数字绣娘”虚拟IP，将千年的传统针法带入元宇宙空间，展现了独特的湖湘美学；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运用全息投影和5G直播技术，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虚实结合的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成功吸引了百万年轻用户在线互动……这种沉浸式体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人们更直观地理解、感受各类非遗瑰宝。

湖湘非遗数字化传承的实践，包含非遗信息采集、数字存储、虚拟展示、互动体验与数字文创等，各环节之间相对独立又互成体系，共同为非遗保护提供“立体式”支撑。信息

采集与数字存储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完整保存文化基因，构建数字资源库，为非遗的活态传承奠定基础。包括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在内，多所省内高校研究团队通过近景摄影测量，采集了湘绣木雕、陶瓷、湘绣、织锦等非遗实物的高精度数据，完善了非遗采集数据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整理和标准化管理体系。同时，基于云存储以及分布式数据库等技术，实现数字化非遗资料的跨地域共享和便捷调取，为开展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提供了稳定的数字资源载体。

数字化转型赋能非遗的具体实践

VR与AR技术的日渐成熟，让非遗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桃源刺绣VR数字化设计项目”便是利用VR技术，通过创建虚拟场景与交互游戏，还原传统刺绣工艺的创作过程。观众不仅可以在虚拟展厅进行360度全方位刺绣欣赏，还可以通过虚拟交互的方式，了解非遗传统工艺的制作流程及传统审美。该项目也包含AR技术，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扫描非遗元素，自动触发AR技术展示出其相关信息，如相关解说词、工艺流程的动画演示等，更准确有效地获得用户所关注的传统文化内容。此外，还有“神秘湘西”非遗VR剧场项目，通过VR技术实现观众穿戴虚拟苗族银饰，体验苗族传统舞蹈；在张家界大峡谷的AR导览中，游客通过扫描实景，就能触发土家织锦AR制作演示。这些项目利用VR与AR技术，极大提升了游客参与度，进一步拓宽了非遗的数字化表达方式，实现“破圈”传播。

开发数字文创产品。数字文创产品是通过

文化转译、设计再生的手段，在深入挖掘非遗内涵的基础上将传统元素巧妙融入现代产品设计，打造出有特色、有品位、有价值的文创产品。在湖南师范大学湘绣研发中心，团队将传统湘绣图案和技法进行数字化处理，开发了多种数字化湘绣产品，保留传统湘绣精美工艺的同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使用需求。

非遗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困难和着力点

目前，湖湘非遗数字化传承已经构建起了数据采集、存储、展示、互动各环节彼此耦合的完整体系，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在机制、标准、技术层面等不断改进完善，逐步构建起完善的非遗数字化传承运行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健全技术标准体系，统一数据采集、处理和展示规范，在确保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建设普惠性、共享性平台，推动非遗数字化为大众共创共享，使数字化手段真正服务于非遗传承的核心需求。另一方面完善数字版权保护机制，构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障相关从业者、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未来的数字传承平台建设，需要更加注重用户交互性。着力构建“内容定制、互动分享、智能推荐”的用户交互平台，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非遗资源的智能分类与传播。例如，“非遗虚拟博物馆”在传统线下展览形式的基础上，优化展览内容及多媒体展示技术，通过互动体验、虚拟讲解、在线研讨等形式，让公众深入了解传统工艺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数字文创产品研发，更应

注重使用场景和传统文化的契合，将传统非遗中的文化元素变为符合当代审美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让传统文化从“陈列馆”走向“使用场”。同时加强跨界协作，实现非遗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市场转化。在文旅、教育、电商等多领域打造丰富的应用场景，将数字化非遗植入景区体验、在线课程和文创电商等消费环节。借助数字营销工具及网络新媒体平台，增加非遗产品市场知名度的同时增强消费者的参与度，从而实现文化、科技与经济效益的共赢。在这种模式下，构建出“技术驱动—内容创新—市场盈利—传承反馈”的完整体系，促进传统文化价值与经济收益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还需深化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的合理性研究，思考适合不同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传承模式，避免过度追求技术呈现而弱化文化内涵，推动形成良性的非遗数字化生态系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机关联、辩证统一。湖湘非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研究，深入挖掘背后的历史脉络、文化寓意，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注入持久而深远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创意设计及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数字媒体设计方向负责人）



培养大学生心理“三力”，助力健康成长

罗美霞 钟诚诚

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大学生面临的压力与困境随之增加，心理健康问题愈发突出。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因素。《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根据不同年龄段需求开展教学，同时注重个体差异，引导学生掌握必备知识、树立求助意识、学会应对挑战，从而提升心理素质。结合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与群体特点，心理健康教育要着重关注大学生哪些心理素质培养？这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课题。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与希望，承载着家庭、社会的深切期望。大学阶段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是简单输送心理知识与技能，更需要教会大学生如何关注自我、如何维护心理健康。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早期的心理发展期，认知发展、情感体验、社交需求非常丰富，自主探索意识强烈，有一定的认知与判断能力，但也是情绪容易动荡与冲动的阶段，加之社会竞争与压力交织，往往心理波动较大。基于此，笔者认为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心理“三力”，即心理觉察力、心理情绪力、心理复原力。

培养心理觉察力。心理觉察力，是一个人对自我内心状态、周围环境、人际关系变化等的认知知觉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用心感受过程细节的能力，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观察分析的思维能力。拥有心理觉察力，能让学生理解真实的心理感受，从而不掩盖问题、不逃避问题，这是积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觉察力？一是激发好奇心与探究欲望。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倡导体验式教学，让学生在实践教学、心理体验中探究人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更好地了解与掌握心理变化；鼓励学生主动输出观点，引导学生将心理体验与互动活动通过文字记录或语言表达输出，更好地捕捉与觉察心理差异。二是提升自我认知与意识能力。这是心理觉察的基础，能让他们更准确地洞悉与分析自我。引导学生从身体自我、心理自我、情绪自我等方面，多维度、多视角自我剖析，综合原生家庭、教育背景、性格等方面，形成更全面、更客观的自我认知，并随着环境与成长变化，不断更新自我认识。三是培养换位思考与共情能力。通过团队心理辅导、人际互动、角色扮演，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更好地觉察自我与他人。

培养心理情绪力。心理情绪力，是指一个人识别、理解、管理自己情绪以及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大学生处于身体与心理成长的高峰期，情绪与情感体验非常丰富。一是调整认知，培养积极心态。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提出情绪ABC理论，认为情绪和行为的结果(C)并不是由诱发事件(A)直接引起的，而是由个体对诱发事件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信念(B)所引起的。因此，可以通过改变人们对事件的不合理认知，进而改善其情绪与行为问题，培养更积极的心态。二是学会情绪表达与管理。情绪有正面积极与负面消极之分。负面情绪其实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比如警示、激励、促进成长等。在察觉这些感受后，大学生需要认识到负面情绪是正常且普遍的，试着接纳它们，学会通过口头表达、记录写作、绘画等方式表达出来，而非任由其失控。这些方法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练习，从而帮助大学生将消极转化为积极。此外，还需掌握调整的方法。当强烈的愤怒袭来时，它通常不会持续超过12秒，此时，不妨做几次深呼吸，以平复内心，或者选择运动和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状态回归平稳。

培养心理复原力。心理复原力，是让人从逆境中恢复如初、抵御压力的重要能力。一是要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每个人都可成为自己的心理咨询师，通过学习基本心智技巧来增强自身对话，在困难中磨砺视角并找寻出路。二是树立求助意识。这需要依赖健康的人际网络，当感到无力时，应向周遭环境汲取力量，以他人之援撑过情绪的低谷。三是认识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是常态。这并非意味着对挑战的妥协，而是在面对未知时，能够以平静而坚定的心态去应对。比如，当计划被打乱时，不必执着于“为什么事情没按我的意愿发展”，而更应该问自己“如何调整以继续前进”。更重要的是，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小确幸”，将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通过关注和提升学生这方面能力，使他们能够增强心理自愈力、心理自助力，进而更勇敢从容地面对挫折与困难。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避免大学生遭受长期负面影响，也是维持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心理觉察力、心理情绪力、心理复原力，是个体心理健康教育的三种关键能力，需要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持续关注与培养，使之成为大学生的心理可持续发力，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分别系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本文为湖南省教育教改课题“体验式教学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运用策略研究”（ZJGB2023496）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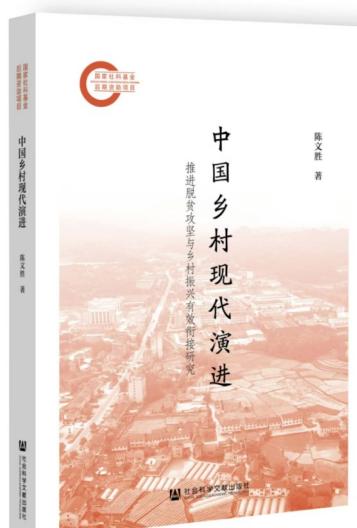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探究

——评《中国乡村现代演进》

王文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一个重要命题。陈文胜教授新著《中国乡村现代演进》对这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方法，研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转型的基本理论、方向与现实途径，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探索构建相关制度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有益参考。

对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刻理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同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历史性解决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面临的绝对贫困问题，让亿万贫困人口同步迈入了小康，创造了世界奇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后，推进乡村振兴成为让全体农民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该书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制度逻辑四个维度，分析两大战略的由来、依据、动力、趋向、体制机制等，是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深入阐释。



基于新视野的关于两大战略衔接的理论探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形成、发展、演进，需要适应中国国情、遵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遵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脱离了这三大情景，这两大战略就失去了根基与方向。该书突破了“就衔接谈衔接”“就乡村谈乡村”的一般性研究视域，融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社会转型、城乡关系、大国小农的国情视角，探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根本动力、现实基础、战略目标、路径选择，这是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深入探究、对其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体现了对衔接方向的准确把握，赋予了乡村振兴研究更加宽广的理论维度。

遵循新要求的关于两大战略衔接实践的深思。“真正的挑战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正如该书前言指出的，这种转换“既是对政策制定的考验，也是对理论研究的挑战”。该书从发展理念、实现路径、发展动力、体制机制、政策体系上对两大战略的衔接，以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转型的实践道路作了全面深入分析。尤其是以“精准扶贫”倡领地湖南

以及湖南省内唯一乡村振兴示范市——长沙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开展了案例研究，为两大战略有效衔接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实践经验，从而有效回答了从理论到实践转换的难题，使得该书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特征。

面向新征程的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考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质，就是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该书基于对大国小农的区域差异性、区域发展模式与路径多样性的现实把握，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方案，在整体层面与区域层面将现实、趋势、政策结合起来，提出建立健全基础性制度体系、差异性政策体系和多维度保障体系，努力实现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与实现路径的多样性相结合、国家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相结合，这正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所需要的科学制度支撑。显然，这一研究可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都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需要从理论上理清方方面面关系，准确把握宏观趋势和现实条件，形成科学判断，为实践提供有效指引，因此著成这么一部书的难度可想而知。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为既有学界研究成果的重要补充，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部重要著作，值得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细读深思。

（作者系民盟湖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焦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部署，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十四五”以来，湖南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产教融合型企业头雁效应已具雏形。长株潭城市群入选全国首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株洲市产教联合体成为首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已成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重要作用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转型升级的主力军。产教融合型企业拥有较强的市场资源转化能力，有利于促进教育、产业要素的集聚融合与优势互补。2019年以来，以长株潭城市群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为示范，湖南省完成了四批次共计540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定。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企校联合完成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35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达3家，居全国第2位，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中车株洲所等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标杆典范，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同时，湖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13条重点产业链全面起势，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不断聚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校企协同育人的中坚力量。产教融合型企业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协同能力，有利于将产业需求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职业院校专业围绕产业动态调整。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建有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18个，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35个，校企共建产业园184个、技术创新平台462个，建设了一批产教融合实训中心。产教融合型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实践，通过共拟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教学资源、共育师资队伍、共建科教平台等形式，推动了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人才培养向更高质量转变。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先行者。产教融合型企业拥有较高的技术资源共享能力，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从2019年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到2023年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有关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组合式激励政策措施持续完善，符合各地实际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工作有序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规模、质量蓬勃发展。尤其在今年初，《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印发，这一系统性政策供给，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明确了发展路径，增强了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发展动力。校企协同，培养大批用得上、离不开的高技能人才，已成为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硕果。

产教融合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湖南作为制造业大省，截至2024年末，“四上”企业数量已突破6万家，但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不到600家，企业育人主体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联动规划还不紧密，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培育、建设和发展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主要原因还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政策驱动不足，校企协同育人资源利用不充分，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因此，要切实推进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以政策体系为引领，信息平台为支撑，评价机制为保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

优化产教融合型企业政策体系。地方政府作为政策调控者，要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发展与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同步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新格局，基于各自发展实际，细化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认定的具体条件。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完善产教融合政策体系，构建企业自主申报、行政管理部门审核、行企校协同建设培养、各级政府分类分级认定制度体系，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多元化、可持续性发展，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信息平台。创新协同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发展综合性工程，汇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方合力，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搭建产教融合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以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为根本，汇集人才培养、资源开发、科研项目、技术服务、就业创业等信息，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科研项目研制，从成果转化到创业孵化，不断激发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以此增强企业联合培养职业教育人才的社会责任感，打造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校企协同育人共同体。

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评价机制。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全过程管理制度，制定符合省、市、县（区）三级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考核办法，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信息公开与反馈机制，鼓励产教融合型企业积极总结在培育、建设、推广等各阶段的经验。同时，树立产教融合典型，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发挥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示范引领作用，以点上突破辐射带动产教融合新格局面上创新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作者系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教授。本文为2023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评价体系研究”（2023JJ60198）阶段性成果】

新域